

南宋江湖诗派

张宏生

一、江湖诗派的形成

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中叶，大致上有以下三重因素。

(一) 社会因素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南宋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南方人民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都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都市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吸引力，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包括江湖游士在内的物欲追求的经济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熟。

其次是政治社会的日益黑暗。南宋政权建立后，一百五十年间，从秦桧开始，历经史弥远、丁大全，直至贾似道，多数时间是奸相当权。他们不仅自身生活侈靡，而且卖官鬻爵，排斥异己，使得南宋的统治日益黑暗。这些，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客观上无法靠近政治中心，主观上不愿与统治者进行合作，在不具备隐居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便走上了“江湖”。

第三是宋室南渡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靖康乱后，北方士民大批南迁。这些人中，当然不乏大官僚和各种上层人士，他们南迁后仍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因战乱而离乡背井，逃到南方后，生活无法安定，从而成为社会的浮游阶层。

第四是阶级结构的急剧变化。宋代南渡以后，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在兼并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固然多为一般劳动人民，

但也不乏中下层乃至上层地主阶级中的人物。前者可能沦为佃户，或流入城市中成为从事各种劳动的后备军，后者则不然。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下降，但在思想、文化、习性等方面，却仍然属于原来的阶级。这样，依托于权贵势要之门的“琴棋诗酒客”便大批出现了。谋生的需求，也竟成为刺激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

第五是冗官的增多和士人生活水平的低下。宋代南渡以降，“员多阙少”的状况愈益严重，获得实缺非常困难，因此，许多候缺的选人实际上已经接近于游士。此外，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物价越涨越高，这无论对微官、选人来说，还是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都不能没有影响。共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江湖”，自然地形成相对松散的群体。

最后是歌舞升平的社会风气。宋室南渡后，统治阶级文恬武嬉，不思恢复。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也充斥着侈靡之风。这种状况，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和都市生活的影响，容易使诗人们对社会政治现实表示冷漠，而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身。

（二）文学因素

南宋中期，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微。以“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许多诗人都脱离了江西阵营，开始走着自己的创作道路。但只有到了四灵出现后，诗坛才真正有了变革诗风的群体意识。这四位永嘉诗人，公开提倡中、晚唐，尤其是姚、贾诗风，反对江西诗风，影响所及，“江湖诗人多效其体”，终于取江西而代之。

对于四灵，可以将其置于“江湖诗派”这一大概念中进行讨论。这是基于如下的考虑：第一，在时间上，江湖诗人中有许多与四灵生活在同时；第二，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四灵也带有些清客的味道；第三，在诗歌理论上，他们多宗晚唐，反江西；第四，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的许多诗写得通俗

晓畅，清新灵巧，风格相同；第五，当时有的批评家也将二者视为一体。当然，江湖和四灵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但任何文学流派都不可能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流派内部风格相异或相反的情形是毫不奇怪的。此外，江湖诗派本来就是一个芜杂的群体，其中，不仅有许多人学习四灵，也有一些人学习江西。因此，尽管事实上四灵是江湖的先驱，江湖是四灵的发展，但由于二者关系的天然的密切性，仍可视为一个整体。

江湖诗派的出现，在客观上是对宋代盛行的理学诗的反动。宋代，尤其是南宋，理学诗颇为盛行。江湖诗派要想自辟领域，对这种诗风不能不作出认识和反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理学家鄙薄作诗，而江湖诗人则多以诗为业，有的把终生精力投入此中。第二，理学家常在诗中大谈义理，往往索然无味，而江湖诗人则追求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使诗恢复了诗的本来面目。第三，理学家不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而江湖诗人则注重完善作品的艺术形式，经常号称苦吟。

江湖诗派主观上对江西诗派的反对和客观上对理学诗风的反动，使得它开拓了自己的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有了开宗立派，自立于诗坛之上的气魄。

另外，江湖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是与诗人们愈益鲜明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的，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诗社。诗社大约兴起于中唐以后，与唱和之风的大盛是同步的。到了南宋，诗人们结社的风气较之前代更浓，入社者更多，更普遍。据统计，许多江湖诗人都有入社的经历。他们以某种松散的组织的形式，互相唱酬，切磋诗艺，品第高下，其活动是经常性的。再者，入社者盛行标榜之习，往往互相吹嘘，夸大其词。共同的情趣，经常的活动和互相的标榜，是江湖诗人以群体面目出现的重要原因。

（三）个人因素

在江湖诗派的形成过程中，有些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陈起的组织作用。在当时的诗坛上，陈起是一位集诗人、选家和书商的身份于一身的特殊人物。他所刊刻的大量的中晚唐诗集，显然迎合了当时的诗坛风云，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陈起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他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份。这样，他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自然体现其中。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江湖诗人的创作，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扶持。第三，他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他经常借书、赠书或赊书给江湖诗人，使得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最能反映出陈起的影响的，是他所刊刻的《江湖集》。这个集子，以收录同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既总结了宝庆前一个阶段的创作成果，也推动了宝庆后江湖诗风的大普及，使得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站了起来，由过去的散漫的组合，一变而为集团性的行动，从而大大扩展了诗派的社会影响。它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

2. 刘克庄的领袖作用。一个诗派的领袖，往往能够促进这个诗派的发展。刘克庄的领袖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他的诗歌创作成就突出，为同辈和后辈诗人所学习和仰慕。第二，他喜欢提携后进，受到江湖诗人的追随。第三，他有着比较丰富的诗歌创作理论，特别表现在反对江西，学习晚唐方面。另外，他论诗求变，带动一批江湖诗人超越四灵，为江湖诗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

二、江湖谒客的生活形态及其所体现的文化意义

江湖诗人与江湖谒客的关系，天然是不可分的。谒客每即诗

人，诗人多兼谒客。

江湖谒客是兴起于南宋中后期的一个以诗为主要行谒手段、以达官权贵为主要行谒对象、以求乞钱财为主要行谒目的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乞钱的具体内容，大致上有以下四种：干求买山钱、干求生活费用、干求应举之资和享乐之资。他们行谒的方式，是谋求有地位的人为之介绍、称扬，并以自己的诗一同投献。他们的行谒，固然需要漫游江湖，不断尝试，但若能对所谒者的性格、爱好等方面有所了解，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则可以增加成功的概率。他们所投献的作品，在写法上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一般说来，最好兼有颂扬对方功德、诉说自己处境两个方面，同时，还应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这样，才能引起被谒者的兴趣，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求得经济上的施舍的干谒之举，唐代就已存在了。这是与进士科举密切相关，由行卷之风派生出来的一种现象。但是，唐代举子干谒钱财，只是谋求应举的资助，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应举。到了北宋，干谒之风进一步发展。下层知识分子干谒钱财已不再与进士行卷密不可分，而且，已开始用诗歌直接表现自己的这种愿望。这固然与科举考试实行了弥封制，因而举子无从行卷有关，但也不可否认，游士阶层此时已开始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以谒取钱财为目的的谒客阶层的真正形成，却是在南宋，这从规模、范围及程度等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来。其间的原因，前面谈到江湖诗派形成的社会因素时已有所涉及。此外，宋代幕府和荐举制实行的种种情形，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谒客阶层的出现。宋代的幕职官体制较之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南宋，幕僚人数急剧增加。这反映出，在冗官体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入幕已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入仕道路。士人入幕，主要职责是协助府主，襄理事务，但由于宋代文化发达，文化素养普遍提高，则彼此之间也常有文学上的关系。府主的喜好，使得士人以辞章入

幕成为可能，而入幕途径，他人引荐和以文自荐这两种都是常见的。不过，南宋中后期，官冗日甚，入幕也并非易事，因此，采取各种手段求售乃至摇尾乞怜，在谋取幕职时都并不少见。荐举的实行也有类似的情形。由于“势要之嘱托”是能否获得荐举的重要因素，干请之风因而大盛。许多士人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惜卑躬屈膝，有的还采取了投诗求知的方式，并为此作了精心的准备。上述这样的求幕职和求荐举者，与江湖谒客的行谒方式的区别不是很大。

当世显人对谒客有时是慷慨的，后者以一诗一词而获得厚饷的现象亦屡见。个中原因，首先应从宋代的文化背景中去找。宋代崇尚文治，登上政治舞台的多为饱学之士。他们本身的文才既好，同时也爱奖掖文士，招纳文客。此外，这一现象也体现出特定时代的士风影响，即害怕讥议。许多江湖谒客在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也正是以此为武器来进行报复的。

南宋江湖谒客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改变。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隐士在中国起源很早。最初，大抵带有不满现实而避世的性质。其后，随着道家思想的日渐盛行，隐逸本身也有了价值。但隐逸虽然是一件不失为高雅的事情，若无一定的物质条件保障，也非常人所能忍受。同时，不管隐逸本身的条件和吸引力如何，若要知识分子全部走向山林，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无法说通也无从做到的。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便出现了“朝隐”的理论，并日渐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它和“小隐”（即隐于山林）并行不悖，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的生活理想。

然而，这一传统却随着江湖谒客的大批出现而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些人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务举子业”，

也不愿枯守山林，成为一个非官非隐的阶层。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对都市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市井小民可以通过物的交换牟利，江湖谒客则把作诗当成谋生的手段，这样，诗歌便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对经济的依附，诗人也有了作为一个职业存在的可能，尽管这都是不充分、不彻底的。在话本小说和戏剧的发展中，文人逐渐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书会才人们不仅已成职业作家，而且有了自己的团体，这与江湖谒客的生活方式之间显然有着一定的影响。

三、江湖诗派的成员

江湖诗派以陈起《江湖集》而得名，但这个集子早已亡佚。所幸残本《永乐大典》尚保存着九种江湖诗集，明、清人的影、抄、刊本江湖诗集也有十一种以上，这些集子，连同当时一些笔记、诗话、书目中的记载，就成为我们确定江湖诗派成员的原始依据。

但是，陈起初刻《江湖集》的收录标准已不免含混，后出诸集，更是混乱。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些标准对诸江湖诗集所收的178位诗人进行鉴定。这些标准是：

（一）社会地位 江湖诗派中人应是以布衣、游客为主体的下层知识分子，但考虑到江湖诗派活动时间较长，其中有些人后来曾应举或入仕，个别甚至跻于高位。因此，对那些官做得不大的诗人，或虽居魏阙而心在江湖的诗人，也合并计算在内。

（二）活动时间 江湖诗派的主要活动时间应是南宋中后期。上限定为嘉定二年（1209），是年陆游卒，至此，代表南宋诗歌创作成就的“南宋四大家”都已下世，江湖诗派开始正式登上诗坛。下限定为景炎元年（1276），是年南宋亡，诗风亦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三）收录情况 为所有或大部分江湖诗集收录者，一般可

列入江湖诗派中。因为，这至少反映了后世学者、藏书家对其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

(四) 唱酬情况 在当时的诗坛上，陈起是一位特殊人物，他为许多江湖诗人选诗、刊诗，在江湖诗派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诸集中与陈起有唱酬者，当作为确定其为江湖派中人的重要依据之一。

(五) 传统看法 对于江湖诗派成员，文学史上有一些传统看法，应适当加以参考。

用上述五条标准进行衡量，初步确定了江湖诗派成员134位，排除了31位，另有13位因生平不详，姑存而不论。这134位诗人就成为我们对江湖诗派进行研究的基本范围。

四、江湖派诗的主题取向

(一) 忧国忧民之怀

对于江湖诗派，传统看法认为它是脱离现实的。这并不符合实际。

江湖诗人虽然都是下层知识分子，但并非没有政治热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关心国事，对于半壁河山沦于金人之手，有着浓重的故国之思，对于统治阶级的偏安佚豫，不思恢复，有着强烈的愤慨。他们在诗中赞扬主战派，抨击投降派，立场很鲜明。另外，他们对“开禧北伐”、抗蒙战争、南宋的土地兼并、道学家的空言大论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当时所有的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时事，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都有所反映。江湖派诗的政治内涵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农民的关心。南宋的租赋很重，苛捐杂税也超越前代。无论丰年和灾年，农民们都生活很差。江湖诗人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官府督催租赋时的凶残和农民悲惨的处境。当时出现许多逃户，决非偶然。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另一面，是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江湖诗人也进行了揭露。

但是，主题的相同并不说明没有区别。即以表示渴望恢复的作品而言，江湖诗在深度、广度和强度上，都比不上南宋前（如陆游等人）后（如郑思肖等人）两个时期的作品。因此，与整个江湖诗在南宋处于低潮一样，其对政治内容的表现，也处于低潮。

（二）行谒江湖之悲

江湖诗人多是谒客，他们要靠投献诗作换取生活资料。但是，行谒并不是一条坦途，许多人常常一无所获，因此反映在作品中，便常有行谒无门之悲。不过，更大的痛苦和悲哀却是来自心灵的。因为，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感到了人格的分裂。唐人的干谒之风也很盛行，但却不象江湖诗人那样经常表现出深深的痛苦和悲哀，表现出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尽管如此，江湖诗人还是不愿抛弃谒客生涯。他们永远生活在这一矛盾中。

（三）羁旅之苦

江湖诗人为了谋生而漂泊江湖，对于他们来说，最具体的问题便是贫穷，包括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但这一点，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太经常而感觉不那么强烈了，于是，他们往往将纪实的笔触，转向对漂泊本身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常常感到前途茫然，无所适从，因而更为留恋、思念自己的家。这种感情，每逢令节，表现得最为强烈。归既不得，便只有在书信中寄托乡情之万一了。但自己的情形固然不易表达，家书的传递也非常困难，这都使他们经常沉浸在悲哀之中。有时，他们终于返乡了，贫困的情形却又终于使他们不遑安居，于是又踏上了行程。这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的冲突。

（四）友谊之求

江湖诗人长年漂泊，他们对友情更为渴求、更为珍视。无论是他乡遇故知，还是结识新朋友，都使他们有着意外的欣喜。但

相聚毕竟是短暂的，别后的思念，更为经常笼罩着他们，而梦则成了一种情真意切的表情方式。对于江湖诗人来说，友谊不仅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值得注意的是，江湖诗人似乎对友人太依恋、太缠绵了，以致于他们的这类作品往往带有“女郎诗”的风格。这是因为他们缺少自我提升的意识，情感不能指向更广阔的层次。这也反映出这个阶层充满内省的心态。

五、江湖派诗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表现

（一）纤巧之美 江湖诗人爱写“小”诗。他们的这些诗虽然大都不能小题目做出大意思，但若从表现手法而言，则善于从个别中写出一般，从局部中写出整体。另外，江湖诗人虽不象文学史上一般认为的那样，只能写近体，不能写古体，但他们显然对前者更为擅长，并喜欢以之抒写瞬间感受。用小诗表现小的事物，用笔必然走上细微一路，描写也就比较真切。同时，小诗往往很巧，包括语言之精巧、对仗之工巧等方面。这一美学趣味，本是大盛于晚唐的，于此可见两个时代在审美心理上的认同。但江西诗派提倡“宁拙毋巧”，是则又可见出江湖诗风对江西诗风的反动。最后，小诗在情态上往往很纤秀，这是由于引进作词之法所致。关于江湖诗的“小”，应该提出两点。第一，江湖诗的气象固然小，但比起文学史上的那种一味求大、矫揉做作的“瞎盛唐”诗，则是真诗。第二，江湖诗的体裁固然小，但诗人们能够领数十年风骚，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如果他们抹杀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则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失败了。

（二）真率之情 真率放任，无所拘检，是江湖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或许是由于这些人身处下层，思想感情与市井小民有所沟通，因而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正统思想的桎梏的缘故。这种特色，在他们表现亲情、友情，陈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时，都

有所反映。最突出的,是他们真实地表白自己对个人欲望的追求,真实地披露自己在精神追求和物质利益面前的矛盾。江湖诗人追求真率的审美要求,至少在四个方面影响了作品的形式。第一,用笔往往一气直下,颇少峭折之致。写景、抒情、咏物的诗中都有这种情形。第二,近体特别是七律多用流水对。唐人用流水对,虽也是出于内容的需要,但也每有打破句法的完整、使全篇构成新的组合的要求,而江湖诗人似乎更多的是考虑感情的抒发。第三,七言律、绝多用复辞对仗。唐人运用复辞,主要表达一种含蓄的、潜气内转的效果,江湖诗人则注重表现上的直致和外化。第四,七言绝句多用顶真和重言的句式,从而在短短的篇幅里,尽可能充分地表达诗人的抒情中心。江湖诗人求“真”,在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唐诗重情,但更重“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唐以后虽开始有了率性的倾向,但不如江湖诗人那么露骨。江西诗派倡“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其末流往往过于追求文字技巧,从而淹没了性情的抒发。江湖诗人出之以真率,是对这种诗风的反动。宋代理学家偶尔作诗,多宣传封建教化,与江湖诗人直抒一切个人感情的诗风更是格格不入。

(三) 俗的风貌 江湖诗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低下,这使他们的生活与一般市民较为接近,能够观察到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也能够体味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同时,南宋时期,市民文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身处下层的江湖诗人对此显然是熟悉的。凡此种种,都不免影响江湖诗人的创作,为其注入世俗的内涵和技巧。

(1) 题材之俗。宋诗较之前代,题材扩大了,到了江湖诗人手中,这种趋向进一步发展。他们写向书商购书,写村儿学字,写恶婢作态,写船家生涯,写论财嫁娶,买卖婚姻。这都是前人不大写的题材。另外,他们还写了一些表现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城市中侈靡生活的作品,写了一些表现爱情生活的作品,写了一

些抒发具体的人生感受的作品。

(2) 表现手法之俗。这可分四点来谈。第一，露而尽。具体表现在表意直达，意境近于耳目所见。第二，切而近。这一点，在抒情诗中表现为入情切事，在咏物诗中则表现为“着题”。第三，对仗求工。布局匀称，属对工巧的诗受到当时一般读者的欢迎，实质上，也是对江西诗风的反动。第四，句意求熟。这首先表现在字句陈熟，意象不能生新。其次表现在命意凡熟，不能用旧题材做出新意思。复次表现在律调轻熟，流之于滑。这些，与江西派诗相比，当看得更为明显。

(3) 语言之俗。江西派诗也喜用俗语，但江西诗人是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之进行审视、把握，从而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拿过来，通过新的组合，使诗歌由不平衡、不协调达到新的平衡和协调。江湖诗人运用俗语则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什么点缀。具体地看，则表现在诗歌的口语化和以谚语、习语、方言等入诗两个方面。不足之处，是有时有打油和文字游戏的倾向。

(四) 清的趣味 “清”这一审美情趣是江湖诗人学习晚唐诗风的一个方面，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是语言之清新。江西诗人也讲清新，但重点多落在一个新字上，即不落窠臼，戛戛独造。江湖诗人则仍取其传统义，指不用典、不雕饰、重白描、重自然，以浅显易懂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表现对大自然和社会的感受。第二是境界之清寂。宋室南渡后，以陆游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诗人较少表现清寂之气，只有到了抱负不大、偏于内省的江湖诗人手中，这一境界才得到充分渲染。另外，他们与僧人的频繁交往，也对创作有所影响。第三是风格之清瘦。这种风格的出现，主要是为江湖诗人的性分才力所决定的，但也有矫正江西末流之肥浓的用心。另外，他们的清瘦一路，往往是以五言律诗来承担的。第四是辞气之清和。这主要是指辞气不峭、不拗、不涩、不险，炼字、炼句而出之以自然，其旨亦在于反拨江西诗风。

(五) 时空形态 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江湖诗人作品中的空间是狭小的。由于他们的目光向内转，视野和想象都不免囿于个人的小圈子里。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许多作家笔下不再有气象阔大的句子出现，不再把整个宇宙空间作为认识、调动的对象。另外，江湖诗人多写眼前景色，也是造成这种空间感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想象不能超越目之所见，形诸笔墨，固然真切具体，但也缺少浩茫深远之感。社会空间也是如此。由于诗中多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对人伦之情的描写，社会空间因而大大缩小了。再者，江湖诗人对当下感特别重视，多写“此时此地”，富有切于个人的现时性。这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对时间的流逝更加敏感，对时间的概念更加准确、具体起来。最后，江湖诗人多缺乏历史感，表现在怀古咏史的作品比较少。而缺乏历史感必然缺乏未来感，这更反映出他们的时间观念是紧紧粘附于现时的。

(六) 意象结构 (1) 意象的具体性。运用意象统计和分析的方法，将《瀛奎律髓》中所收的江湖诗和“南宋四大家”中尤、杨、范三家诗进行比较，在自然意象方面，前者的具体性高于后者。这往往使得江湖诗显得细致、生动，但由于过于注意了自然物象的细微之处，也往往限制了作家的视野，减少了作品的容量。

(2) 意象的普通性。所谓普通，指的是江湖诗人笔下的意象群都很常见，用字既不生僻，结构也不奇特，以描述性意象为多。这与江西末流在意象上过于求新，因而流于晦涩的情形是不同的。但这也削弱了诗歌的独创性，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和再创造。意象的普通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多地使用了传统的、长期以来递相沿袭的意象，因而许多诗作常有模仿的痕迹。

除了过多使用陈腐意象外，江湖诗人对意象的使用还有两个明显的缺点。第一是喜欢重复，一旦有了成功的意象，往往竞相效尤，遂把这些意象的一点清新之气淹没了。第二是有的意象支

离，造成全篇结构不完整。

六、江湖诗派与南宋的晚唐风

南宋中后期，晚唐诗风笼罩着诗坛。无论从创作实践看，还是从诗歌理论看，或是从选本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看，都是如此。江湖诗派则是提倡晚唐诗风的主要力量。但所谓晚唐，¹按照《唐诗品汇》的标准，实际上指的是中晚唐，大致上可以从姚、贾开始，向后推移。江湖诗派提倡晚唐诗风，虽然与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出于文学上的考虑，即反对江西诗风。江湖诗派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是以学晚唐来代替学杜甫，而是认为盛唐、杜甫的高远境界未易遽学，因而选择了有门径可入的晚唐诗。事实上，后期江湖诗派也认识到了晚唐之弊。同时，江湖诗人由学晚唐而进盛唐，是对当时有些诗人希望由学江西而进盛唐的做法的反对。江湖诗人的一些理论影响了严羽的《沧浪诗话》。

〔编者注〕本文是作者在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提要。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明史》两戴钦

《明史》中有两个戴钦，一为广西马平(今柳州)人，弘治六年(1493)生，卒于嘉靖五年(1526)，正德九年进士，事迹附见《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另一戴钦明正德十三年时任绥德总兵官，事见《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及卷三〇七《江彬传》，传云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壬子“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两戴钦生活年代相近，易被混同。李裕民编《明史人名索引》体例(十)云：“同姓名人物，经过考证，分别列目，并在姓名后注明其时代、籍贯、字号、官爵、事迹等，以资区别。”但在两戴钦条下，未有注明，可知编者亦将两戴钦误为一人。

• 刘汉忠 •